

人民币国际化过三关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联储应对危机实行数量宽松政策,显示美国通胀与美元贬值风险上升,激发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储备货币安排的新一轮质疑与改革呼声。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方,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估计大半投资于美元债券,美国物价与美元汇率走势对中国影响很大。

国际货币体系通常是比较冷僻的专门领域,目前各界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开放发展阶段阶段性成功,也折射出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新矛盾和新困难。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什么问题?出现问题根源是什么?我们能选择哪些应对方式?什么选择能更好实现我国经济开放自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深入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政策和认识意义。

目前讨论大多从储备资产安全出发阐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要性和途径。储备资产安排是国际货币体系三大支柱内容之一,从这一角度探讨确有必要性与合理性。给定我国持有庞大储备资产背景条件,这一分析思路尤其具有务实性和现实意义。然而对这一重大而深刻问题,还需要从不同角度深入讨论。

本文试图在反思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及其根源基础上,从经济追赶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关系历史视角入手,分析现实改革议程以及我国面临的选择。

国际货币体系三段变革

为发挥国际交易媒介或流动性功能,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至少需要回答三方面基本问题。

一是货币兑换比率与规则;只有通过各国货币兑换才能实现国际交易,汇率制度安排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甚至被看作国际货币体系狭义全部定义内容。

二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收支大体均衡是国际交易平衡运转进行的前提,国际货币体系设定如何采用包含汇率在内各种手段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方法和途径。

三是储备资产选择构成问题;保证国际交易支付过程平稳进行,需要选择一种或若干流动性全球货币作为事前准备资产货币,因而派生储备货币安排问题。

一般认为19世纪末叶近代经济全球化高潮阶段,才出现比较完整意义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今已大体经历三个演变时期。

一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时期。英国19世纪初就实行金本位,然而需要主要国家同时实行金本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国际交易,才进入比较系统成熟的金本位时代。一般认为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比较典型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时期,它与近代经济全球化高潮互为因果。

二是金汇兑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或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这个在二战后建立的凸显美元霸主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运行不到30年,上世纪70年代初退出历史舞台。

三是信用本位制(fiduciary standard);以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与黄金脱钩、浮动汇率制为标志,又称牙买加体系,其核心原则和基本架构延续至今。

虽然影响货币体系演变因素纷繁复杂,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后起国家经济追赶派生的调整推动力,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具有一脉相承的解释作用,因而可以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解释为三次追赶、危机、变革的故事。

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

我们首先来看金本位货币体系。英镑在金本位货币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估计1860-1914年世界贸易中约有六成用英镑报价和结算,英镑在外汇储备资产中占50%-60%最大份额。英镑的特殊地位是英国当时一流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结果。英国最早发动工业革命并实现工业化,是19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是最大服务出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原料和食物进口国。

金本位一战前大致全盛,两次大战期间经历危机与整合,二战后让位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国际货币史上第一次重大危机与变革。两大基本因素推动金本位-英镑时代落幕:一是黄金作为本位货币,其供给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要求;二是美国经济逐步取代英国霸权地位,需要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变革满足国际竞争格局实质演变需要。

首先看黄金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数据显示黄金存量从1850年1万吨增长到1910年25万吨,增长15倍。用欧美等16个主要国家GDP估计的全球经济同期增长3.6倍。对比而言GDP与黄金存量比率上升86%。

大西洋彼岸美国对大英帝国的生气勃勃追赶,则为寻求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历史解决方案提供现实条件。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追赶提速,到20世纪初和一战前已超过英国和欧洲列强。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显著低于英国,但是到19世纪末总量超过英国,20世纪初人均GDP赶上英国。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是英国4.7倍,人均收入是英国1.7倍。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国力耗尽,而美国则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雄厚实力,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拯救者和领导者。与此同时,美国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应运而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对国际货币体系三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一是在黄金作为基本计价单位基础上,通过“35美元/1盎司金”使美元与黄金挂钩,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大体固定兑换比率。

二是国际收支短期失衡和流动性困难甚至危机时,通过调整储备或IMF救助应对。同时规定对经济基本面变动导致的根本失衡,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调整汇率平价加以应对。

三是黄金贵金属和美元同时作为

储备资产,然而由于战后储备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因而美元这只主权信用货币实际成为普遍性储备资产。

要维持这个高度人为性体系持续稳定运行,需要满足三方面难以长期满足的假设条件。

一是黄金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一致,保证黄金的经济稀缺性或潜在相对价格大体稳定。

二是美国拥有并持续增长足量黄金储备,作为维持这一体系信心的“定海神针”。

三是美国潜在总供给或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大体一致,即排除经济追赶过程发生。

四是美国自觉严守宏观稳定自律原则,在内外均衡前提下保证物价持续稳定。

在上述四个假设条件下,美国有可能在维持贸易顺差和投资收益三大盈余基础上,通过对外投资或单方面转移支付,持续向外国流出相当于其经济总量稳定比例的美元资金,从而为外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动性供给。

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能否成功以及多大程度成功的根本因素,在于我们能否正视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和结构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持续追赶创造条件。

实际回顾这一体系的力量,相应地来自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四个不一致的方向。

第一,黄金供应增长不足仍是一个深层问题。1950-1970年全球黄金存量从5.6万吨增长到约8万吨,增幅为43%;同期美国实际GDP增长约1.2倍,德国和日本大约增长4-5倍,五国出口实际增长约2.6倍。黄金供应量增长远远低于实际经济交易规模增长速度,会提升黄金相对一篮子商品价格。

第二,欧日等国对美国追赶,逐步改变战后国际竞争格局,引入颠覆该体系的基础条件。1950-1970年间,法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是美国同期1.69倍、2.05倍和4.53倍。德法日三国同期的累计经济增长幅度均高于美国。

第三,由于居民可用纸币兑换黄金这个贵金属制度下政府货币发行的最重要约束机制早已被法律废除,加上美国战后奉行凯恩斯干预理论政策以及宏观政策受政治周期影响等因素,美国战后出现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显著通货膨胀。长期显著通胀派生美元对黄金高估压力,并鼓励外国政府抛售美元并置换为黄金以套利。

第四,从国际收支结构角度看,美国贸易盈余的减少显示了相对竞争力的下降,这使得美国无力在保证美元价值预期稳定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庞大的单方面转移支付以显现与其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相对应的承诺义务。上述历史事实构成了所谓“特里芬难题”的经验基础。



本报记者 陈逸航 摄

美国战后大规模单方面转移支付,满足了当时欧日和美国其他盟友经济恢复成长对国际交易媒介和流动性需要,客观上对西方世界世界经济黄金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基本规律作用下,美国黄金储备快速耗散,并且不可阻挡地内生出更快耗散势头,根本上挑战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信心。经历多次危机冲击后,1971年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以美国信誉遭受重大损害的仓皇溃败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币占优策略

从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系角度看,至少有四类改革建议需要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在四类建议中,回归金本位、发行世界元和东亚区域货币这三类方案要么是缺乏可行性,要么是道路漫长曲折,因此短期内并非中国的上乘选择。相对来说,做大做强人民币倒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占优策略。

做大做强人民币是指在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开放追赶的同时,培育人民币逐步成长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并藉此推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积极演变和改革。其中包含两个相互联系命题和目标:

一是实现中国经济追赶赶超根本目标;二是要以“人民币第一”为原则,着力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等新兴国家追赶赶超导致国际竞争力分布版图变迁,是国际货币改革诉求的深层根源。由于实现赶超赶超具有主动在我的相对独立性和可选择性,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其他思路具有兼容互补性,做大做强人民币应是我国占优策略。

从中国经济开放成长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降低本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不确定性影响,降低国内企业涉外活动交易成本。本币国际化还有助于摆脱在国际融资币种和期限方面所受到的所谓“原罪”约束,降低对大规模外汇储备过度依赖风险。国际铸币税支付数量甚至方向转变,相应具有改进国民福利效果。另外从“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角度看,成功培育一个稳定、强大、具有国际货币素质的人民币,客观上为美国生产率相对美国生产率从16%增长到76%,该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生产率从6%增长到13%。

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意味着中国经济追赶仍处于前期阶段。追赶进程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将持续展开,构成观察当今经济时代的主线之一。我们同时看到,面对新兴经济体前期追赶,美国作为中心国已经面临外部失衡空前加剧的结构性压力。

中国的经济追赶将是时代主题之一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当代体系呈现“多样化”特点。

一是汇率制度政策选择多样化;大体上发达国家较多实行浮动汇率制,发展中国家较多实行固定或钉住汇率制。

二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包括汇率通过不同机制变动调节国际收支,通过国内宏观政策调节,IMF参与危机救助和调节等。

三是储备资产多样化;美元仍是最大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不同程度承担储备资产功能。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见证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际追赶浪潮,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追赶的主角。从过去一时期相关国家经济表现的绩效验证来看,中国目前无疑是新一轮追赶领跑国。

新世纪最初七八年间,用汇率衡量,中国GDP相对美国规模从12%上升到30%,进出口相对规模从23%上升到69%,固定资本形成相对规模从26%增长到65%。在制造业这个最重要可贸易部门,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生产率从16%增长到76%,该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生产率从6%增长到13%。

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意味着中国经济追赶仍处于前期阶段。追赶进程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将持续展开,构成观察当今经济时代的主线之一。我们同时看到,面对新兴经济体前期追赶,美国作为中心国已经面临外部失衡空前加剧的结构性压力。

在“人民币第一”理念指导下做大做强人民币,需要研究和解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操作性和技术性问题,然而决定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以及

多大程度成功的根本因素,在于我们能否正视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和结构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持续追赶创造条件。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还要过三道坎:

一是倒逼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进程。道理简明清晰,国际货币地位形成最终是各类市场主体自发选择的结果,要上市场最终选择人民币,需要为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币创造更为广泛的资产配置空间,包括逐步允许外国居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人民币回流中国进行投资选择。由此可见,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推进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逐步实现人民币比较完全可兑换目标。

二是倒逼更为灵活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可能三角揭示开放宏观经济学基本约束关系: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三者不能兼得,必然要选择放弃一条。给定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考虑对于中国这样大国来说不可能放弃独立货币政策,过度管制汇率政策将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经济需要。因此中国需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机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以更好发挥汇率作为开放经济基础性相对价格的功能。

三是倒逼组合性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这是为中国经济成功追赶提供持久性动力的最重要保证。从新一轮经济景气与收缩周期经验和教训观察,以下反思和改革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依据30年改革发展经验和现实条件,重新审视人口、土地、粮食安全等基本国情因素,尽快进行必要认识转变和政策调整。

二是以进一步破除国有垄断和扩大准入,为民营经济提供更为广阔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推进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减少宏观调控行政化因素,建立适合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四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五是参与包括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设计和建设。

能源审计:保障节能减排效果的重要环节



林伯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节能减排涉及处罚和奖励,如果没有公正有效的能源审计,就无法进行公正有效的处罚和奖励,将直接影响节能减排的效果。例如,建筑节能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能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商为节约投资,可能不会遵守已有的建筑节能标准,能源审计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节能产业的发展需要严格的能源审计。

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能源审计制度和办法。总结起来,其中政府主导推动能源审计是一个普遍做法。比如,日本委托节能中心对企业进行能源审计;荷兰政府对一些企业提供免费能源审计;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补贴了大约5000万英镑的资金来进行能源审计调查,占能源部总费用的一半,当时英国9万多个企业,就有5万多个企业接受能源审计调查,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中国能源审计起步也不迟。上世纪80年代,原国家经委就曾进行企业能源

审计的课题研究,在全国14个省市11个部门40多个企业做过试点。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在中国举办能源审计培训或试点工作,支持中国开展企业能源审计推广工作。

这些国际合作为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能源审计,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是政府推动节能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收到了效果。但是,之后的节能审计中政府主导的作用相对淡化。一些地方政府做得比较好,如河南省出台了《企业能源审计方法》,使该省的能源审计初步有了工作依据和可操作性。但是,除了一些省份,全国没有普遍开展这项工作。与节能减排相比,目前政府对能源审计的重视不够,但是,能源审计是保障节能减排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的能源审计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

首先,经济转型中的主要问题是能源补贴,当能源价格相对低廉,不反映稀缺和环境成本,对一些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大,或者企业本身节能观念不强,能源审计就是一种负担;对于一些能源效率低的企业,又没有节能的动力,审计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如果审计还要收费,那就更难了。因此,这个企业能源审计对能源审计不自觉,能源审计就需要有



表国 摄

与节能减排相比,目前政府对能源审计的重视不够,但是,能源审计是保障节能减排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

强制性。但是,能源审计中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对淡化,使得能源审计不具备强制性。其次,能源审计机构没有法律地位和权威,使得审计不具备权威。没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能源审计收费标准就低。由于对能源审计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实施细则,各项审计监测标准还不健全,审计人员资格的国家严格认证缺失(如财务审计资格),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较差,审计工作不规范,审计质量差。低审计收费标准进一步造成低审计人员的素质和低审计质量。

再次,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能源审计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得到政府或基金的资助,但目前中国的能源审计受政府支持不多。能源审计的教材、规程、标准等技术书籍缺乏。

经验说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是能源审计的主导。除了主导作用,政府还可以结合各方力量,促进能源审计信息共享。节能需要能源计量、统计、审计等多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同部门的分工既存在联系,也有侧重。但是,事实上中国目前除了缺乏专业的能源审计人才,能源统计力量也相当薄弱。

总结起来,政府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政府需要使能源审计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能源审计需要像财务审计那样,有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资格标准考试和认证,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说,政府可以考虑成立国家能源审计局。此外,政府应在资金上对能源审计给予扶持。

其次,政府需要加强能源审计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政府可以以能源审计为中心,进一步完善整体节能业绩考核体系。国家发改委已明确提出,将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其关键点是作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有效的能源审计,除了用来

根据基准找差距、提出节能降耗方案之外,关键是可以提供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的客观考核依据。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指标可能比能耗指标重要;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产量、销量和利润指标都很重要;因此,能耗高低是否重要,能源审计是否重要,主要看政府提供的动力。将经过严格审计的能耗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就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动力。

最后,完整的能源管理体系是有效能源审计的基础,而能源审计是有效能源管理的重要手段。能源审计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企业能源管理,包括用能概况及能源流程。能源审计其实是对企业能源管理水平的量化考核。长期以来,中国能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使得许多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非常薄弱,粗放式的耗能比较普遍。如果企业能源管理的基础工作不扎实,加上能源审计的种种问题,可能使能源审计弄虚作假,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把握节能减排的效果。因此,政府应督促企业建立比较完整的能源管理体系。对重点耗能企业,必须强化基础能源管理工作,完善能源消耗计量、统计制度,建立健全原始记录。能源审计还可以将计量、统计和节能机构的力量相结合,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各方加强协调,制定相应的能源数据规范。